

学点中国哲学史

为反修防修而学点中国哲学史

哲学系写作组

列宁指出：“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深入领会毛主席最近一系列重要指示，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同时，认真学一点中国哲学史，很有必要。

首先，为了清算孔孟之道的遗毒，深挖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有必要学点中国哲学史。

中国党内的修正主义者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但用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来否认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而且又总是从中国传统思想的反动糟粕中去寻找反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用孔孟之道篡改党的理论基础。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以及邓小平，个个如此。

毛主席在领导全党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中，一贯倡导把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研究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结合起来的革命学风，一贯强调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地向全党提出了学习历史包括学习中国哲学史的任务。毛主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对古代哲学遗产进行“批判的总结”，就是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为了从思想上彻底清算建党以来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王明路线，毛主席号召全党学习马列主义哲学，并用以批判地总结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为此，毛主席亲自写了《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哲学著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其中，对于中国历代儒家一贯宣扬的颠倒、割裂知行关系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以及抹杀矛盾斗争、否认革命转化的反动形而上学，进行了系统的清算，从而粉碎了从陈独秀到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哲学基础。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光辉示范启示我们，要使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必须研究现状，研究历史，通过总结哲学斗争的历史经验，清算反动传统思想特别是孔孟之道的流毒，深挖中国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善于把批修与批孔有机地结合起来。

党内的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之所以无不尊孔崇儒，有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处于社会变革时期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阶级倾向的共性及其反动世界观的历史继承性，使他们总是从孔孟之道中去寻找精神支柱。陈独秀找到“中庸路线”来反对党所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王明鼓吹儒家的“忠孝仁勇”等以适应蒋介石的“限共”“溶共”政策；刘少奇更抛出黑《修养》，大肆贩卖孔孟的修养经，妄图腐蚀全党，瓦解革命。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机会主义头子一贯利用孔孟之道来反对党的纲领路线的严重事实，充分说明毛主席一再指出要学点中国哲学史、把批修与批孔结合起来的重大意义。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内资产阶级狠抓上层建筑，力图利用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制造舆论。孔孟之道仍然是他们攻击和篡改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一九六二年，刘少奇配合国际上帝修反的反华大合唱，连忙再版黑《修养》，大刮尊孔复辟妖风。在他指挥下，有的鼓吹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国魂”；有的祭起孔家店的“仁政”，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有的从中国哲学史中捡来“合二而一”论，疯狂反对“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为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林彪反党集团更挥舞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旗，咒骂秦始皇，吹捧董仲舒，炮制天才论，妄图全面复活孔孟之道，来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步刘少奇、林彪的后尘，又从孔老二那里搬来了“正名”论，狂叫“就是要正名”，要“整顿”，要当“还乡团”；他一上台就挥动孔老二当年杀少正卯的屠刀，妄图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统统砍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流毒几千年、至今阴魂不散的孔孟之道，正在党内形形色色的走资派身上借尸还魂。这种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孔孟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和思想代表，他们炮制的一整套搞复辟倒退的纲领路线，不仅反映了当时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抗社会变革的反动要求，而且也适应了古今复辟派的共同需要。阻挡历史潮流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一样，都是社会大变动时期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要开倒车、搞复辟，就只能和孔老二同走一条道，同唱一个调，并同样地被革命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毛主席亲自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号召广大工农兵登台讲史，评法批儒，总结儒法斗争和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对此恨之入骨，造谣诬蔑，不遗余力，就因为批林批孔运动，打在林彪、孔老二身上，痛在邓小平心上。在反击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再次号召我们学点哲学，学点中国哲学史，继续深入批孔。这是指示我们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更全面地总结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历史经验，更深入地解剖以孔老二为祖师爷的儒家哲学的反动实质，为了把邓小平接着刘少奇、林彪抛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必须进一步从哲学史上深挖他们的反动世界观的老根。

其次，为了借鉴历史上社会大变动中先进阶级在政治上和哲学上反复辟斗争的经验教训，有必要学点中国哲学史。

我国当前正处在一个空前的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半个多世纪以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发展，在我国，实现了所有制的深刻变革，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无产阶级同国内外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正以空前尖锐而复杂的形式展开。

回顾我国历史，从春秋战国经过秦统一到西汉前期，可说是另一次社会大变动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推翻奴隶制，建立封建制，由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曾经历了四、五百年的粉碎奴隶主复辟势力的激烈斗争。这一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典型地表现了社会大变动中的阶级大搏斗必然伴随着一场哲学大论战。而当时的百家争鸣，也基本上是两家争鸣。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及其同盟军——道家、阴阳家等，为了反对社会变革，总是竭力宣扬歪曲现实的唯心论和抹杀矛盾、否认转化的形而上学，鼓吹“今不如昔”的历史倒退论，为他们的开倒车、搞复辟的反动政治路线作辩护。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及其同盟军——名家、兵家等，则努力坚持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路线，宣传厚今薄古的进化史观，为本阶级变革现实的政治实践服务。

儒法两家不可调和的路线斗争，在政治上具体表现为“复礼”和“明法”之争。面临奴隶制总崩溃的局面，充当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吹鼓手的儒家，以孔丘为代表，抛出了“克己复礼”这个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总纲，并制定了一条以“正名”为手段，以“审法度、修废官”、“兴天国、继绝世”为内容的复辟路线，妄图通过整顿已被冲乱了的等级名分，借以保住奴隶主阶级的法权，把被打倒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上台，恢复他们的特权地位，从而全面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明法”的政纲，坚持推翻“礼治”、建立“法治”的革新路线，主张“官不私亲”，“法不阿贵”，“刑无等级”，打破“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旧法统，废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所谓“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就是要否定奴隶主阶级的法权；所谓“察法立威”，就是要根据“法治”路线来建立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

基于政治上的对抗，儒法两家在哲学上也形成了完全对立的两条路线。儒家用“天命”、“神权”来论证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要人们“畏天命，畏大人”，屈服于奴隶主的特权统治；法家则用“天人相分”的无神论戳穿奴隶主的神学欺骗，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战斗口号来鼓舞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法家韩非更以自己的“矛盾之说”，论证了新旧势力是“不可两存之仇”，揭露儒家“中庸之道”的虚伪性；认为“当今”是“大争之世”，新兴势力只要敢于斗争，不怕牺牲，通过“疾风”“大雨”的暴力革命，就一定能够打翻即将灭亡的奴隶主腐朽政权。

路线斗争不可调和。新兴势力必然胜利。尽管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儒家路线曾多次反扑，尽管法家代表人物邓析、少正卯、西门豹、吴起、商鞅、韩非等都在斗争的反复中

献出了生命，但在法家路线指引下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终于以秦始皇的统一中国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秦统一，标志着先进的封建制对腐朽的奴隶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新兴地主阶级已夺取了全国政权。但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利用封建社会初期还残留着奴隶制经济的成份，还严重存在着奴隶主阶级的法权，进行猖狂的复辟活动。因而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秦始皇不愧为杰出的法家政治家。他勇于坚持革新路线，严厉镇压复辟势力，能够揭穿吕不韦炮制的《吕氏春秋》混淆儒法的折中主义诡辩，能够识破王绾、淳于越之流利用奴隶主法权思想来鼓吹分封制优越的复辟阴谋，并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有力措施，提供了在文化领域对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的可贵经验。但秦汉之际以赵高、项羽为代表的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一度得逞，反映出封建社会初期实际存在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新兴地主阶级还面临着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巩固政权问题的严重任务。

西汉前期，由新兴地主阶级依靠和利用农民大起义的巨大威力而重建的封建政权，从汉高帝刘邦、肖何、曹参，直到汉武帝刘彻、张汤、桑弘羊，经历了几代坚持尊法反儒的政治思想路线，形成了相继不断的法家领导集团，因而能够一贯地实行诸如废除世袭分封，防止分裂割据，摧垮工商业奴隶主的经济、政治实力，抗击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颠覆活动，铲除新生复辟势力得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等等措施，终于逐步巩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汉的法家领导集团自发地进行了一场从多方面限制并逐步消灭奴隶主阶级法权的艰巨斗争，因而取得了反复辟斗争的胜利。

在这场斗争中，西汉中央政权所信用的青年法家思想家贾谊、晁错、桑弘羊，在批判儒家思想传统、捍卫和发展法家思想路线方面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们对汉初儒生们刮起的攻秦反法的翻案妖风，给予了坚决回击；他们通过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揭露了儒生们鼓吹“天下已治已安”的和平演变阴谋，尖锐地指出了保留世袭分封的特权必然产生的复辟危险的严重性。他们不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提出并推行了一条坚持反复辟斗争的法家路线，而且在思想理论上提供了批判武器，坚持了朴素唯物论和朴素辩证法的法家思想路线，对于汉初方士儒生拚命宣扬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和“是古非今”的反动历史观展开了有力的批判，对于儒生们及其祖师爷孔老二虚伪反动的丑恶灵魂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们紧密结合政治斗争所进行的哲学斗争，用进步舆论来压倒反动舆论，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历史表明，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前期，法家作为当时的先进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从邓析、少正卯直到贾谊、桑弘羊，他们长期进行的反孔批儒的哲学斗争，都是直接服务于本阶级的夺权和反复辟的政治斗争的。这一过程中，不少典型的事例表现了社会大变动时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通过学点哲学史，了解这些斗争的进程，从中引出规律，分析特点，总结经验，作为借鉴，对于我们在当前社会大变动中更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

底，显然是有裨益的。

再次，为了总结我国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压迫、否定等级特权的革命思想传统，有必要学点中国哲学史。

“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我国阶级社会的历史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奴隶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所仅见。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总是用革命的暴力反抗剥削阶级的黑暗统治，打翻了一代代反动王朝，粉碎了一次次复辟逆流，推动着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同时，对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为剥削制和等级制作辩护的反动统治思想，不断地展开了愤怒的批判，在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革命思想传统，创立了自己的革命哲学。

春秋时期，“名声若日月”的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就从原始公社瓦解后出现了一小撮“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剥削者，来揭露享有世袭等级特权的奴隶主贵族的罪恶，指出：“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对于孔老二“妄称文武”、美化奴隶制的“多辞谬说”，痛加驳斥，并明确宣称要用革命的金锤来砸烂黑暗的奴隶制，建立一个“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理想社会。被奴隶们“诵义无穷”的柳下跖，不愧为我国“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

战国时期劳动农民的思想代表许行，在严正驳斥复辟派孟轲的“剥削有理”论时，也提出“君民并耕而食”的社会理想，揭露一切“厉民以自养”的剥削罪恶，坚决地否定了被一切剥削阶级视为“通义”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法权思想。

历史表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人物，只是要求用封建制来代替奴隶制，而不可能反对剥削制度，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而奴隶和农民的思想代表，却一开始就把反对剥削制度及一切等级特权作为自己的革命哲学的灵魂。历史还表明，新兴地主阶级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难以战胜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粉碎复辟逆流的历史任务，是由农民革命战争来完成的。在秦末农民革命战争中，陈胜、吴广从根本上否定世袭等级特权的“王侯无种”论的革命哲学，发挥了巨大威力。正是这次农民革命战争的大扫荡，从经济、政治、思想上沉重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才为西汉前期法家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准备了历史前提。

此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在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发展着的农民革命思想，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要推翻剥削制度，废除等级法权，用革命暴力建立一个“等贵贱，均贫富”，人人平等，共同劳动，“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世界。汉末黄巾军描绘了财产“共有”、“共享”的社会图景，并曾设置“义舍”，“义米”，初步加以实践。唐末黄巢大起义，高举“均平”、“大齐”的革命旗帜，奋战十年，纵横万里。到宋代，起义农民把“均平”思想具体化为“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把封建等级法权斥为“邪法”，主张彻底加以铲除。到明代，由邓茂七“铲主仆、贵贱、贫富而一之”的革命号召，到李自成“除暴”、“均田”的具体纲领，把“农民运动中最革命的思想”推进

到新的水平。太平天国的英雄们，总结历代农民革命思想，终于形成了被马克思、恩格斯热烈赞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完整的农业社会主义纲领。

从反封建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农民革命理想，虽然具有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违反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种从“均平”要求出发的、主张消灭剥削压迫乃至消灭私有制的社会理想，“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因为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革命愿望，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它在彻底否定剥削阶级的等级特权上，更始终具有革命的积极意义。列宁指出：“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这些理想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是非常宝贵的”。

他们为了粉碎奴隶主和农奴主用天命神权来辩护世袭等级特权的种种谎言，提出了“王侯无种”、“贵贱由人”的反天命思想，宣称劳动人民是战天斗地的“巨人”，能够“知世”，敢于“冲天”。这种“打倒天”的唯物主义，集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革命世界观，把历代唯心主义虚构的超自然的有意志的“天”打翻在地，还世界以本来面目，砸碎了精神枷锁，唤起了革命风雷，显示了劳动人民革命哲学的鲜明党性和巨大威力。

他们为了戳穿历代反动派鼓吹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之类的形而上学诡辩，提出了“民起怨，事必变”的辩证发展观，肯定“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而要实现劳动人民的这种地位转化，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在“明”与“暗”、“红”与“黑”、“正”与“邪”、“帝”与“妖”两种社会势力的生死搏斗中，所谓“中庸之道”、“忠恕之道”全都是欺人之谈。“杀尽不平方太平”，就是劳动人民在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革命逻辑。

他们为了回击反动统治阶级宣扬的“上智下愚”、“小人易使”之类对于劳动人民的诬蔑，提出了“小民从来不可轻”的进步历史观；从秦末起义农民宣布“氓隶之人”“宜为王”，到元末红巾军欢呼“朱衣人作主人翁”，都深刻地表明劳动人民对自己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有朴素的认识，深信劳动人民能够推翻反动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作天下的主人。

仅从以上简单的例举，已足以说明，我国劳动人民留下的哲学遗产是十分光辉的。通过学点中国哲学史，认真研究、总结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革命思想传统，无疑地会有助于我们真正树立奴隶们创造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唯物史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把工农群众诬蔑为“群氓”；他竭力鼓吹“要表现帝王将相的智慧”，而大肆诬蔑革命群众运动是“极左”，把一切都“搞乱”了，“问题成堆”。总结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哲学贡献，可以充分证明实践出真知，“卑贱者最聪明”的伟大真理；而从孔老二到邓小平都狂热鼓吹“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正好自我揭露了他们不过是一丘之貉，不过是一小撮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高贵者最愚蠢”的可耻典型。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为了彻底清算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世界观基础，为了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哲学斗争的经验来为现实的反修防修斗争服务，我们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认真地学一点中国哲学史。